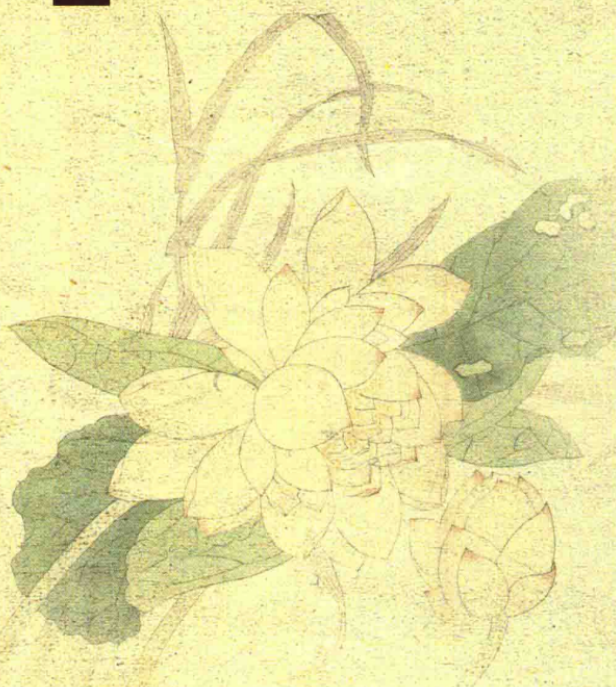


鄞縣慈善史

张如安 孙善根 著

九曲河书系

浙江古籍出版社



九曲河书系

鄞縣慈善史

张如安 孙善根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鄞县慈善史 / 张如安, 孙善根著.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6

(九曲河书系)

ISBN 978-7-5540-0065-6

I. ①鄞… II. ①张… ②孙… III. ①慈善事业—历史—鄞县 IV. ①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2363号

鄞县慈善史

张如安 孙善根 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电话: 0571-8517698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关俊红

责任校对 吴颖胤

封面设计 刘欣

责任印务 贾敏

照 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0065-6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一

王卫平

鄞县历史悠久，作为中国最早设置的古县之一，长期以强县、望县、名县而著称。自古以来，鄞县依凭靠海的优势，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经济发达，实力雄厚。而且鄞县是文化之乡，人文荟萃，盛况罕见，以至于有学者称南宋王朝中期的近百年间为“鄞人时代”。富庶的经济条件和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为鄞县慈善事业的兴盛创造了有利条件。

鄞县还是个好善之区，同治《鄞县志》中称“鄞人乐于趋义，善举綦多”。慈善事业在鄞县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汉以来官员百姓的行善之举代有所闻，宋代以后，更是义风大兴，扶贫恤穷、养老慈幼、济婚助丧、施医舍药以及兴修水利、赈济饥荒、捐资助学等慈善公益活动广泛开展，义举层出不穷，善人前后踵继，以致南宋时曾有“义郡”之誉。在众多善举之中，鄞人崇文重教、捐资办学始终是一个亮点，无论南宋时重视难童教育，还是清代义学遍布城镇乡村的现象，抑或清末民初新式学堂的广泛涌现，乃至当代旅港鄞籍有“红色资本家”之称的王宽诚、“地产大王”陈廷骅等对内地教育事业的慷慨解囊、巨额捐赠，无不体现出一以贯之的传统。悠久的传承，长期的积淀，多样而丰富的慈善活动，成就了鄞县“慈善之乡”的地位。可以肯定，历史上鄞县的慈善事业，无论在慈善事业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还是在全国都是比较突出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华慈善总会以及各地各级慈善总会相继成立为标志，慈善事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关心帮助受灾之民和社会

弱势群体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识。尤其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以后，全国人民的慈善热情空前高涨，各级慈善组织在救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慈善事业得到健康发展，是广大有识之士必须思考的课题。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古人有益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之一。慈善实践呼唤理论研究，慈善实践也在推动着理论研究。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传统慈善史研究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尤其近几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中，不断出现慈善史研究课题，2011 年，《中国慈善通史》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课题。这些情况固然值得高兴，但不能忽视的是，如果没有各个区域、各个地方慈善历史研究的铺垫，全国性的慈善通史研究很难深入，质量很难得到保证。从这个意义上看，《鄞县慈善史》的编写出版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示范意义，值得充分肯定。

本书的两位作者长期从事宁波地域文化和慈善史研究，勤奋治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张如安教授所著《北宋宁波文化史》《南宋宁波文化史》《鄞县望族》中对鄞县历史上望族文化与区域社会生活的探讨，孙善根教授所著《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中关于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的分析考察，都为本书的撰著提供了质量保证。

全书资料翔实，内容全面，见解新颖，叙事生动。作为一部地方慈善通史性的著作，需要追溯源流，梳理脉络，揭示特点，解析成因，费时耗力，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通读全书，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两位作者爬梳文献的苦劳、伏案书写的艰辛。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

当然，本书中的一些说法还可以斟酌，比如说宋代以后官方的赈济与慈善的关系等，在此我只是提出来供读者诸君思考与讨论。

我希望《鄞县慈善史》只是一个开头，能够对各地起到引领作用。我相信《鄞县慈善史》的出版一定能够推动中国慈善史研究不断趋向深入。

序 二

杜建海

我国学界对于区域慈善史的综合研究，从现有成果看，还属于起步阶段。2005年12月，湖南师范大学周秋光教授和他当时的硕士研究生曾桂林撰著的《中国慈善简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据我所知，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慈善史研究的第一个集大成之作。2011年9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王卫平教授和黄鸿山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曾桂林副教授等撰著的《中国慈善史纲》出版，也是这方面的力作。从省、地（市）到县（市、区）层面的区域慈善史研究看，至今只有一部，即周秋光等著的《湖南慈善史》，可谓凤毛麟角。2011年12月，以周秋光教授为首席专家并由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中国慈善通史》开题，意义不言而喻。但目前可资参阅的慈善专史、慈善断代史以及区域慈善史等著述相对匮乏，这部通史的编纂要在四年内完成，达到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又弥显珍贵。我们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党校牵头组织，历时两年多编写完成的这部《鄞县慈善史》，涵盖古代和近现代两大部分，较为系统地梳理了鄞地各个时代重要的慈善组织、事件、人物以及慈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县（市、区）乃至地（市）级小区域慈善史方面的不足，也为慈善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小区域的翔实样本。

南宋高官、文学家楼钥认为家乡明州（今宁波）是“义郡”。南宋四明学派、淳熙四先生之一的沈焕曾说“吾乡义风素著，相矜相恤，

不待甚富者能之”（宝庆《四明志》卷11《乡人义田条》）。鄞县作为“义乡”，的确有悠久的慈善传统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它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教育和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对此，我在《鄞州慈善志》里把它们概称为“慈善地理”。其一，环境易灾，互助成俗。鄞县地近东海，多山林，而且处于四季分明的亚热带地区，各地不同时节都会有各类自然灾害，且频发；江海湖河溪遍布，又多港湾，大大小小的水利桥梁工程需要建造和反复重修；人口相对集聚，而人均土地资源较少，时有饥荒和疾病，城乡社会以及居民之间形成了相互救助的伦理观念，历朝历代的善堂善会层出不穷，盛行不衰，并已积成乡风民俗。其二，宗族聚居，相携成风。鄞人尤喜聚族而居，名门望族迭出，宗族内普遍形成了鉴于地缘和血缘开展的睦邻恤亲之义风，大多成为宗族的慈善传统。其三，教育开化，崇尚仁爱。从王安石治鄞以来，儒教和科举教育逐渐发达，举人进士辈出，特别是建炎南渡以来，赵氏宗室家族以及许多北方达官贵人、文人移居鄞地，鄞地成了京畿之地，入仕为官的人大幅增加，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士官文化，推动了官方以及士人的慈善活动发展，也促进了民众的儒学修养普遍提高，仁义慈爱、积德行善理念深入人心。其四，宗教劝化，从善如流。鄞地也是佛教传入较早地区，佛寺一直比较兴盛，乐善好施是寺庙僧尼的重要义务，居民笃信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慈悲为怀、悲天悯人蔚然成风。进入近代，基督教、天主教在鄞地逐渐流行，教会兴办了大批慈善机构和学校、医院，影响巨大。其五，官方救助，引领行善。长期以来，鄞地富有官方救济的传统和兴办的慈善机构，地方官员和退居乡里的鄞籍官员主导的善举影响力巨大，引领作用非常明显。其六，商帮发达，义利并举。自宋以来，即有鄞人专业从事商贸，近代，鄞籍商帮纷纷在沪、津、汉口等地创业，后来又远赴港、澳、台以及南洋等地，比较勤勉务实守信，经济实力强大，有“义利相兼”的经营理念，自利利他，互惠互利，宁波帮帮宁波，义无反顾。由此

种种，慈善思想和行为已经成为鄞地居民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南宋时，史浩、沈焕、汪大猷等在家乡创建乡曲义庄田，乃至近代民国时期义庄、义田、义学、义冢等纷呈，数量和规模甚大。至今屹立的灵桥及其诸多遗存的慈善文物古迹，已成为甬城慈善之乡的象征；现存近代实业家、金融家严康懋兴建的慈善建筑群，已成为鄞邑宗族慈善的象征。1948年发生的“江亚轮”巨大海难事件，沪、甬两地合力救助善后，已成为宁波商帮慈善壮举的象征。鄞地慈善史实和史迹之丰富，使得以县（市、区）级为单位的小区域慈善史的编纂显得十分必要，而且内容可以相当厚重。

《鄞县慈善史》研究得以顺利展开，得益于鄞地有很好的史志编纂传统和保存相对齐备的地域文献。从宋元“四明六志”（宋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到民国《鄞县通志》，十余种官修或民撰的涉鄞府县方志，充分记录了当地各个朝代的慈善组织和人物事迹。鄞地有120多个姓氏，据我研究，目前有近700种家谱现存于世，数量在国内同类行政区域中遥遥领先，这些家谱大多记载了宗族及其乡贤的慈善史实。此外，还留存有《东钱湖志》《小溪志》等乡域性志书，从而为微观层面保留了较多慈善信息。此外，鄞地及其相关文人的个人文集、笔记等，也留存了许多的慈善史线索。近十年来，宁波大学张如安、孙善根和宁波工程学院陈家桢、周淑芳等一批学者以及鄞地专家，博览群书，钩沉爬梳，开展了慈善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北宋宁波文化史》《南宋宁波文化史》《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申报〉宁波资料汇编》《大音希声：宁波慈善文化》等相关成果，特别是以鄞籍宁波帮人士为重要对象的宁波帮研究，已经成为现在宁波文化研究的显学，《宁波帮大辞典》《鄞籍宁波帮人士》《宁波帮志》等成果又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鄞地慈善文化的研究内容。而我和张如安、孙善根等持续四年多不懈合力编著、与本书即将同步出

版的《鄞州慈善志》，为《鄞县慈善史》的编写奠定了较好的史料基础。

张如安教授专治宁波文学史和文化史等，他承担撰写了《鄞县慈善史》“古代部分”。由于研读地方文献和家谱资料等较为系统深入，掌握的慈善文献史料非常丰富，且擅长深透地分析阐述，对鄞地由南宋至民国时期几百年的义田救助制度历史演变和传统作了详尽梳理，对宋及清朝官方和社会民间慈善活动的形态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描述，对鄞人屠隆等的慈善思想、宁波南明时期的政治慈善等诸多方面首次进行了研究剖析，见解独到而且新颖。孙善根研究员长期侧重研究宁波民国社会史，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和宁波帮是他研究的主要课题方向，他的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选题，著有《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一书。他承担撰写了《鄞县慈善史》“近现代部分”。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尤其对整个民国时期鄞地慈善组织和大事进行了清晰完备的阐述，充分介绍了时代社会转型剧变、战乱动荡时期鄞地诸多善堂的救助对象及其项目指向的创新，其中反映的沪甬两地鄞籍商帮与乡村公益的无私建设，使人读后不禁感叹万千，且对今日企业家广施善举和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也会有许多教益。

当然，由于鄞地慈善文献史料的分散性、慈善人物的流动性和慈善行为的隐匿性、民间性⁴⁵，本书对鄞地各个时代慈善组织及其人物事迹，特别是对旅外的鄞人慈善组织和鄞籍慈善人物活动的研究和介绍会有不少遗漏，对鄞地众多佛寺及高僧大德慈善举措的系统介绍明显不足。慈善是鄞地的乡风习俗，百姓参与度很高，由于乡邦文献零星分散或缺少文本记载，当然也不可能充分浏览现存的众多宗谱，所以本书对“慈善风俗”，尤其是旧时乡村的形形色色“善会”组织以及活动没能进行专门的梳理介绍。对于这些缺憾，《鄞州慈善志》将会有所改进和弥补。尽管如此，现在的宁波城区向来是鄞县的县城，鄞县又是宁波望县，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充分揭示了鄞县乃至宁波是当之无愧的“义乡”的肌理和特质。

这是一部称得上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小区域慈善史研究专著，对于当代鄞州区百姓创业致富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社会治理创新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和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等都会有较大的学习、参照和启示意义。这也是我们在编纂鄞州区慈善总会委托课题《鄞州慈善志》的同时，组织力量完成这一课题研究的目的。

2013年4月1日

（作者系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鄞州慈善志》主编）

目 录

序一	王卫平
序二	杜建海

上编 古代慈善史

第一章 先秦至北宋鄞县慈善活动钩沉	三
第一节 宋前鄞县慈善追溯	三
第二节 北宋鄞县慈善的发展	八
第二章 南宋、元代鄞县慈善之风的高涨	二二
第一节 南宋鄞县的官方慈善与救济	二四
第二节 南宋鄞县民间慈善的三大形态	三二
第三节 南宋鄞县民间慈善的伦理结构及施济主体	五四
第四节 元代鄞县慈善活动概述	六九
第三章 处于低潮的明代鄞县慈善	八九
第一节 鄞县官方慈善与救济	八九
第二节 鄞县民间慈善的三大特点	九九
第三节 鄞县民间慈善的主要项目	一五
第四节 鄞县学者的慈善思想	二四

第四章 清代鄞县传统慈善事业的再兴	一四〇
第一节 清初鄞县义士的政治慈善	一四〇
第二节 鄞县慈善组织的新发展	一四七
第三节 鄞县捐资办学的热潮	一五四
第四节 鄞县个体慈善概描	一六一

下编 近现代慈善史

第一章 晚清时期鄞县慈善事业的演变	一七七
第一节 鄞县传统慈善救济事业的式微	一七七
第二节 近代鄞县慈善事业的兴起	一八八
第三节 鄞县外来教会慈善事业的举办	一九二
第二章 清末民初鄞县慈善事业的转型	一九七
第一节 鄞县传统慈善救济事业的演变	一九七
第二节 鄞县近代慈善事业的兴盛	二〇六
第三节 鄞县公益事业崛起	二二三
第四节 鄞县外来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三四
第五节 旅外鄞籍人士慈善事业举隅	二四五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鄞县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五三
第一节 鄞县旧式慈善事业的重组	二五三
第二节 鄞县地方政府救济事业的进步	二六〇
第三节 鄞县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继续发展	二七七
第四节 鄞县旅外商人与鄞县乡村建设	二九二
第四章 抗战时鄞县慈善事业的变化及其挫折	三〇二
第一节 战时状态下的鄞县慈善事业	三〇二

第二节 鄞县沦陷时期慈善事业的挫折	三一〇
第五章 抗战后鄞县慈善事业的重建及其困境	三一五
第一节 鄞县慈善公益团体的恢复与重建	三一六
第二节 鄞县近代公益慈善活动	三三六
第三节 慈善事业重建中的鄞县政府与地方社会	三四四
第四节 鄞县慈善事业重建中的困境	三五九
第五节 尾声	三六二
主要参考书目	三六九
编后记	三七七

上

编

古代慈善史



第一章 先秦至北宋鄞县慈善活动钩沉

鄞县历史上素有劝善和行善的传统，清同治《鄞县志》卷2说：“鄞人乐于趋义，善举綦多。”^①这道出了历史上鄞县人的个性特点及传统美德。但是鄞县早期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民众救助的能力和手段十分有限，慈善伦理思想处于蒙昧状态，这些都决定了鄞县早期的慈善活动是零星发生的，社会影响并不大。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早期鄞县慈善活动鲜被记录下来。进入唐代，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浙东出现了历史性的明、越分治局面，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又把明州州治从小溪移至三江口，明州地域开始实质性开发，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于是以官方为主导的慈善救济活动才有了少量的记载。进入北宋，伴随着宁波文化的正式形成，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义”的伦理价值观念被本地域的居民凝聚起来，宏扬开来，至此鄞县民间慈善迈出了较快的发展步伐。从此以后，鄞县的慈善事业绵绵相承，史不绝书。

第一节 宋前鄞县慈善追溯

鄞地古代的慈善救济活动，发端很早。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早期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行为蕴涵着慈善的萌芽。

于越国至勾践继位（前496—前465），开始强大起来，始与句吴交兵，演出了一幕幕吴越争霸的悲喜活剧。勾践曾对申包胥说：“越国

^① [清]同治《鄞县志》卷2《义举》，光绪三年（1877）刻本。

之中，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①据《国语·越语》记载，越国的疆界“东止于鄞”，故勾践实施的以尊老爱幼、恤困疗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政策，必然惠及了处于越国东境的鄞地之人。

民国学者杨积芳指出：“今之善举，皆古之政教。如《周礼》司徒掌邦政以睦姻、任恤分属万民，蜡氏掌除馘之类皆是。自政教衰，则听民自为。”^②所谓“政教”指的是官方的慈善与救济，所谓“听民自为”指的是民间自发、自愿性的慈善行为。但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自秦汉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鄞县的慈善事业罕有所闻。传说东汉时琅琊人黄璜字伯玉，寓居鄞地之林村，施药济人。他有一个女儿黄姑，养父不嫁，传父之术，造福百姓。当地人感念他们的恩德，肖父女像于圣女山之巅，后来又移祀林村，南宋时敕赐昭惠庙，专祀黄姑^③。

东汉时，官方的慈善活动当有惠及鄞人者。如永元十四年（102）四月庚辰，“赈贷会稽（等）流民下贫谷各有差”^④。元初六年（119）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⑤。这些措施主要针对社会弱势群体及受灾人口，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时鄞地属于会稽郡，会稽郡的赈贷、赐棺木、除田租及口赋等举措，必然会在鄞地有所落实。

鄞地的慈善活动，至唐代始有更为明确的文献记载。自广德元年（763）袁晁农民起义被镇压后，至大中十三年十二月（860年1月）裘甫起义爆发，明州社会出现了近百年的安定。政府官员致力于发展生产，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大历六年（771）刺史裴傲有鉴于袁晁之

① [先秦]《国语》卷19《吴语》。

② [民国]杨积芳：《余姚六仓志》卷16《义举》，王清毅、岑华潮点校本，第300页。

③ [清]张恕：《南兰文集》卷3《圣女庙黄姑记》，光绪五年（1879）刻本。

④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和殇帝纪》。

⑤ 同④，卷5《安帝纪》。